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DR-NT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Singapore.

Title	重写中国近代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对现代性的回应 = Rewrit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echoing the modern during the early 1990s
Author(s)	van Dongen, Els
Citation	van Dongen, E. (2013). 重写中国近代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对现代性的回应 = Rewrit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choing the modern during the early 1990s. In Fudan Daxue Wenshi Yanjiuyuan (Ed),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13-225.
Date	2013
URL	http://hdl.handle.net/10220/40273
Rights	© 2013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This is the author created version of a work that has been peer reviewed and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on behalf of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It incorporates referee 's comments but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publishing process, such as copyediting, structural formatting, may not be reflected in this document.

重写中国近代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对现代性的回应#

Els van Dongen*

一. 冷战后中国近代史的再书写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受苏联影响极大，在动荡的上世纪 90 年代也不例外。1991 年 8 月的苏联政变中，苏共强硬派密谋反对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这与其后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一道，都对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政治上，鉴于社会主义的处境，中共转向它处以寻求有效的合法性来源。在知识界，冷战的结束使得议题不只局限于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引发了对中国现代性的性质及其与中国传统之关联，华人身份，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在 1990 年代初期创造了所谓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理论。这一理论是 1980 年代流行的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理论的延续，它强调稳定、政治集权以及借助中国文化与民族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新保守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对苏联一系列事件的反应，亦是对 1980 年代涌现出的政治自由化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面对从两方面而来的危机，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一方面强调政治集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依靠新的合法性来源的重要性。同时，该理论主张继续经济改革，是故分析家们将这一理论视作介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中间道路。不论这是否为实，其中重要之处在于，传统中华文化成为补益陈旧的社会主义的手段，被当做工具使用。安东尼·史密斯曾准确指出，作为一种认同范畴，阶级的概念仅仅拥有有限的吸引力；而与之相反，中华文化的概念则有更广阔的包容性。

1

1990 年代早期最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倡导者分别是高干的亲属，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家萧功秦（1946-）。他们在提出渐进式经济改革方案的指导文件中使用了新保守主义这一术语，是为对 1991 年 8 月苏联政变失败的回应。²这

* 作者单位：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译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诸颖政。

¹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3), 5-6.

² 参见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中国之春》，1992 年第一期，第 35-39 页。

份文件提议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资源——也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理性主义思想——中的合理要素，并力主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根据中国国情重新解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而所谓国情，包括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有限，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所造成的发展受阻，以及最后一点——中国的悠久历史与传统。他们还比较了新保守主义的这些特质与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时代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政策中的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在上海历史学家萧功秦版的新保守主义理论中，他主张依傍于传统中国元素，充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介”或者“载体”。同样的，萧功秦也强调中国的国情要求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萧氏认为，在这一方面，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要，因为他代表了中国人的“国性”。他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增长的重要性，而不同意社会变迁是基于自然法与抽象目的的。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萧功秦是通过中国近代历史来阐释他的观点的。他通过重新解释 19 世纪晚期翻译家严复(1854-1921)的著作，论证了近代化只能以一种实乃中国传统之延续的方式得以进行。³

萧功秦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显示出在学界，冷战的结束与 1980 年代晚期自由主义者们直接对抗战略的失败所带来的问题意识，已经超越政治合法性这一议题。1990 年代早期学界讨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他们在论及有关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改革，或者冷战的结束这些问题时，都要通过重访(revisiting)中国近代史来完成。一般而言，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解释，这其中有一种典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旧典范被抹杀殆尽。相反，新旧两种典范是并行存在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这一时期可被描述为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这一模式被称作“两半”模式，因为近代中国社会被定性为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1980 年代初，“两半”模式已经遭到批评。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革命史学。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掩盖了故事的另一面，即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情形。1980 年出现了“三个阶梯”框架，将关注的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上。由此，

³ 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萧功秦的《严复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及其启示》，《中国青年报》，1991 年 2 月 6 日，第 3 版。这篇文章的扩展论述版及萧功秦的其他有关新保守主义的文章收录于《萧功秦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近代史经过重写，成为了一部现代化的历史。

有了这种新的解释框架，一些过去受到负面评价或研究不多的的事件如今又受到重新评价与审视。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的研究兴趣再度复兴。鉴于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革命终究成为了改良，便又有了革命是否必要，是否不可避免这样的问题。过去马克思主义史家批判戊戌变法，是因为戊戌变法乃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推动，且抵制农民革命，而当下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则在于改良运动为何失败。为此，他们援引心理分析法，试图勾勒出改革者们的观念世界。例如，萧功秦将康有为对“大变、速变”的执着，归因于其自身对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的危机的主观认知。正是康有为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在头脑中产生了要改善现有状态的想法。⁴类似的，中国近代史学者马勇也认为，康有为的心态在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中可称典型，他们都无法接受任何瑕疵。⁵

其次是辛亥革命被指为乃是一部分头脑发热的知识分子所炮制，它将中国引入了混乱与军阀割据的境地。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中，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场民主革命，它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在《告别革命》（1995）这本著名而充满争议的著作中，著名哲学家李泽厚（1930- ）与文学评论家刘再复（1941- ）认为，革命已经被“搞砸”了，若是当初沿着康有为、梁启超宪政改革的路子，情况本应好些。对李泽厚、刘再复而言，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过于注重意识形态、主义与上层建筑。他们所提倡的是以经济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合作、渐进式改革以及社会与政府的分离。⁶其灵感则来源于卡尔·波普尔、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及哈耶克。

历史书写中的第三处重要修订在于，五四遗产如今受到了猛烈地抨击。在过去数十年中，五四运动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追求及其对科学民主的大力提倡被解释为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如今，知识分子们却强调五四运动对传统的破坏性。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错误的认为，欲立新，必先破旧。正如拉纳·米特（Rana Mitter）所言，1990 年代以前，五四的宝藏在不同世代间传递，不同世代强调五四遗产的不同组份，但如今，遗产本身已不存在。⁷中国知

⁴ 此类例子可参见萧功秦：《自序》，《萧功秦集》，第 9 页。

⁵ 马勇访谈，2005 年 9 月 1 日。

⁶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第 4 页。

⁷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识分子质疑了中国观念中的自由主义，因为这导致了六四运动的崩溃，也因为这与中国传统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性解释出现在 1989 年 5 月，恰逢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在一些为此庆典而出版的书籍，以及一些学术期刊如《东方》、《学人》、《原道》中，都有知识分子们对五四运动的本质或其精神的反思。

最后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如今遭到公开批判，并被作为与现实脱节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典例。文化大革命也被视为彻底反传统主义的案例，因为与五四运动一样，它也坚信“不破不立”。虽然在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还因为其左倾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体系不一致（见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述），但他们显然并未以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态度这一视角为取径研究文革。

二. 对激进主义的批判：现代性的质疑？

总体而言，所有这些重新解释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延续的关注。改革被认为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应该建立在具体经验而非抽象设计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都存在着错误，他们或是坚信实现现代化需要完全破除旧事物，或是认为现代化究其本意就是新。知识分子们对这种对现代化的简单化理解提出了质疑，因为在这种将中国近代史重写为激进主义的几个阶段的历史中，传统全无立锥之地。对一些人而言，激进主义的第一阶段起于 1898 戊戌变法中不切实际的改革计划。辛亥革命则是激进主义的第二阶段，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盲目追求抽象的共和理念，而非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激进主义的第三阶段乃五四运动，因其同样过于乐观而不够实际。另外也有其他知识分子将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 1980 年代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视为激进主义的不同阶段。

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时刻因其对保守主义的压制而受到指责，而现今保守主义已成为褒义词，并被与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健康、理性的现代化模式相联系。这意味着这一术语被用来批评五四运动这一在有关 20 世纪中国的课题中受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共同批判的运动。在 1990 年代以前，保守主义的概念多被当做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进步思想者的标签，保守主义者就是那些阻碍现代化的铁

杆传统捍卫者。而如今，激进主义才被当做阻碍理性、健康的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力量。

如今的激进主义与各种具有明确贬义的概念相关联，如非理性主义、乌托邦、进步主义、文字改革、反传统主义与工具主义。由于目前激进主义被片面地表达为恶的力量，而保守主义则被占据了所有优点，这可被视为 Koselleck 所说的“非对称性对抗概念 (asymmetric counterconcepts)”⁸的典例。这意味着设定了二元论的作者将他们的立场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读者们只能否定激进主义的对抗概念，并认同他们的立场。此外，激进主义的对抗概念的持有者则大多不认同这一立场。正如 Koselleck 也提到的那样，简单化的二元论的设定是基于论战的原因；相比其理论价值，它们更多的是政治工具。

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对保守主义的评价，以及对现代化应该以某种方式包括传统的认知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已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首先，与保守主义这一话题的突然交锋受到两位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这两人皆倾向自由主义。他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史学家余英时与威斯康辛大学的史学家林毓生。他们二人都试图将政治自由主义与转变中的中国传统的延续相结合。余英时 1988 年 9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自世纪之交起，激进思维模式就主导了中国人的头脑。”⁹在余英时看来，这一过程起于 19 世纪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西方价值体系。在五四运动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笼罩下，为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国，传统信仰被破坏，因而儒学被进一步削弱。

另一位对中国大陆将中国近代史重写为激进主义的各种表现产生影响的是历史学家林毓生。林毓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 (1919-1969) 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其后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哈耶克——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早在 1979 年，林毓生就在其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批判了五四运动，此书在 1983 年被译成中文引入中国。¹⁰林毓生在其中着力批判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将之称为五四一代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 (totalistic

⁸ 有关这个概念的阐释和例证，参看 Reinhart Koselleck, "The Historical-Political Semantics of Asymmetric Counterconcepts," in *idem,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5-191.

⁹ Yü Ying-shih,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edalus* 122, no. 2 (Spring 1993), 125.

¹⁰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iconoclasm)。此外，林氏还认为，这种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一直延续到了毛泽东思想中。而林氏则更属意于他所谓的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对林氏而言，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目标，即科学、民主与自由必须继续，但这些目标与中国传统间的关系须得重新审视。

除此之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提法常常被用于“改革还是革命”这一百年老话题的辩论。激进主义尤与革命中的过激行为相连，而保守主义则多与改革的务实相连。对改革与革命这两种模式的讨论在贬斥法国大革命、肯定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过程中得到发挥。英国光荣革命成就了君主立宪制与《权利法案》的基础，而并未付出太多鲜血的代价。但是，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论》(1790)一书中是从保守主义的观点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批判，即他所抨击的是自然法思想体系本身。而中国知识分子则是借抨击法国大革命来主张渐进式的改革或借此批判暴力革命。正如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他们并未参与对现代化性质，尤其是其时间概念的批判性反思。

90 年代初，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都认识到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过去与现在应该是连续而非断裂的。除了陈来这样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如刘军宁、马克思主义者如李泽厚也都批驳了破除传统才能进步这一观念。前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们曾坚信文化大革命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求，而如今，他们却试图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相调和。中国传统的“创造造型转化”这样的提法到处可见，这显示出五四自由主义者中那些攻击传统文化观念的人对传统的态度变得更为温和。即是官方对儒学的重估，也明显地打破了过去完全否定传统的格式。如前所示，这一重新评估在定性方面所用甚大。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言，只要传统在某方面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传统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源而非威胁。¹¹

虑及于此，那么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解释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第一个层面上，正如前文所述，对激进主义的否定往往包含着对革命实践的否定。对于一个将合法性基础建立于革命之上的政党而言，这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被用来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这一问题直接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相关联：一个将合法性建立在革命之上的政党在当下却偏离了革命的路线，

¹¹ 谢武军：《评中国当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当代思潮》，2001 年第 4 期，第 20 页。

结果将会如何？如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改革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一种迁就资本主义需求的后社会主义。这如何能与社会主义理想相协调？¹²

从更根本的层面上看，重写中国近代史也意味着对“何为中国人”的重新解释。否定激进主义的言外之意，毛时代的阶级同一性与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或称之为中华性)的概念让位于更宽泛的“中国性”概念。这种更宽泛的“中国性”概念由文化而非政治或领土条件所界定，这是一种对文化中国的呼吁。知识分子们所表达的是对超越了政治中国国家限制的文化中国的忠诚。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们以革命除旧的现代化概念相反，文化中国的支持者们所向往的现代化是一种渐进式发展并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现代化。

虽然中共也应时代需求调整了其以阶级为基础的中国性概念及其政治民族主义，但官方对中国传统的再想象与学界的文化转向仍有很大不同。中共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可分为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涵盖了所有人民，在另一个层面上则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与所有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一种极大地服务于政治合法性需求的建构。相反，对知识分子而言，对激进主义的否定和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评价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不只是中国的，还包含着终极真理的基础上的。关于终极真理，下文将有进一步阐释。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性，同样显示出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重新解读。在 1992 年以来中国社会商业化的背景衬托下，对过去的反传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批判，激发了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重新联系。对中国传统历史延续性的鼓吹，使得知识分子们越发强调他们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用。中国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上层精英观点，使他们主张自己在中国性的定义中要扮演重要角色。

事实就是，历史被用于有关中国未来的辩论中，而这显示出历史的一项为人所公认的新的关键之处，即历史有助于重建国家认同概念。因而，对中国近代史的讨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着。一方面，历史成为了辩论的媒介或工具。历史构建了一种政治话语的结构，以此为切入点引出伦理、政治、社会或经济等超出历史本身范畴的问题。然而，这种为了讨论通常是敏感政治话题的问题而援引历史的做法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影射史学”(allusion historiography)的表现。一些海外学

¹² Arif Dirlik,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idem and Maurice Meis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9), 362-384

者将大陆重写历史的行为归咎于政治气候的限制，但知识分子仍然不会仅仅是提到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事件，他们更要重新解释这些事件。这意味着历史同样构成了讨论与学术研究的对象。

三. 中国现代性批判的两面性

至此，冷战结束在 1990 年代的中国所引发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历史书写的改变俱已揭示，而这两者均涉及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评价。但是，是否还存在对现代性概念的哲学挑战？要批判表现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性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批判能够扩展为对现代性本质特性的更彻底批判？对新左派知识分子而言，否定激进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们只攻击社会主义。虽然因为法国自由主义模式与法国大革命都被当做传统本身受到了批判，这并不完全正确，但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后来的批判只是为提倡经济改革服务，而不是为了从哲学层面反思现代性。

中国知识分子讨论中国近代史时常常提到埃德蒙·柏克，但正如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言，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尤其被援引来抨击文化大革命。因此，批评的矛头并不指向法国大革命背后的逻辑和整个思想体系，而是指向文化大革命这一具体事件。此外，虽然柏克认为改变是为了保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没有保护的能力，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援引柏克只是为了强调 1990 年代初期经济改革背景下的改变的重要性。尽管苏联事件之后在 1989-1991 年间有很多人质疑进行更多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到 1992 年，继续改革才是正确的道路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有人论称对历史延续性的提倡其实是一个保守主义命题，在中国学界使用曼海姆所用之术语则表明了保守主义思维方式的存在。而对曼海姆来说，保守主义思维方式是一种超越单一保守主义形式，又与这些保守主义形式相关联的动态组合 (dynamic configuration)。保守主义思维方式的关键问题是自然法模式的启蒙思想，以及其进步主义。¹³但是在中国的语境里，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也同样支持历史延续性观点，而这两者都不曾质疑过启蒙运动或现代化的根本信条。第二个关于真正的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批判确实存在的论据应该是中国知识分

¹³ Karl Mannheim,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Kurt H. Wolff, ed., *From Karl Mannhei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32-222.

子更相信具体经验而非抽象设计，他们更能接受部分的、渐进式的改革。然而，虽然柏克也在其中被提到，人们却回应称这只是改革时代的官方实用主义的回音。对具体经验的重视还表现在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换言之，虽然知识分子们并不一定认同保守主义的目标，但他们仍对问题以保守主义的论据做出解答。

就保守主义目标而言，改变的目的应该是保护传统、法律、习惯、风俗等所有归属社会大众的东西。克林顿·罗西特曾提到以“哲学保守主义”(philosophical conservatism)保卫保守主义目标。这种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以具有一定历史感为特征：真正的保守主义更倾向于稳定而非变动，倾向于连续性而非单次实验，也更倾向于过去而非未来。¹⁴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参考了许多保守主义论题如社会有机体理论、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具体重于抽象、历史发展的概念，以及其他一些论题，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而支持这些论题的。他们以那些论据为基础提出的历史延续性并不一定源自现代性危机感；他们并不认为社会需要维护，因为现代会导致理性化、异化与个人主义。

即便知识分子们因为拥护保守主义目标而主张保护中国传统，他们的论点却在某种程度上与在整个 1990 年代仍吸引着知识分子们的百年来对现代化的探索相抵触。在中国保守主义常被援引用以强化现代化范式。这使人想起史华慈所提出的那个关于保守主义在共和中国的有趣问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现代化的人们是否能被视为守旧派？”¹⁵对笔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明显是“否”，从哲学角度来看，现代化者们并不认同保守主义的时间及变化概念。

在其初始语境中，如曼海姆所言，保守主义不仅是对启蒙运动的一般意义上批判，还是一种针对其进步主义精神的批判。这种进步主义的特点在于一种可能性意识。相反的，保守主义则崇尚具体和定性。至于变化的性质及时间的概念，进步主义考虑问题从超越的方面入手，如未来的乌托邦或者超越原则。或者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注重起源(germs)，而进步主义注重规范(norms)。对激进分子而言，现在只不过是未来的开始，而保守主义者则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历史链的终结。进步主义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是超越实体(transcendent entity)。而保守主

¹⁴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Melbourn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5), 5-9.

¹⁵ Charlotte Furth,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idem*,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0.

义者则认为时间是有机。

如缪勒(Mueller)所言，保守主义者的时间概念具有空间性，他称之为同空间性(conspatiality)。然而中国对现代性的批判却鲜见对现代时间概念之哲学原理的质疑。遗憾的是，对某些人来说，将传统纳入仅仅是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已。援引传统只不过是现代化与发展主义的普遍框架做一脚注而已，最后仍然对现代化与发展主义盲目接受。正如田中(Stefan Tanaka)在其文章中曾指出的，对真实性的追寻实际上就是现代。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所反对的很少是现代性的概念，而更多的是西方观念中的现代性。萧功秦这类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非正统现代性仅仅是强化了他们试图批判的典范而已。换言之，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的回归更多的是为现代性需求所推动，而非是认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而认为其应该被保留。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信奉进步主义的时间逻辑，他们依然在参与田中氏早先提到的第一部分的竞赛。

中国对现代性的批判呈现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攻击现代性即破旧这一前提。但另一方面，这种判断又有助于现代化的进行；传统可以中介之方式居于此进程中。当批判未有后见之明，就很难有真正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中国版现代化的反思实际上被对通过更可行的途径实现现代化的渴望所驱动着。由于现代化被视为西方的产物，故对其的反思多集中于其是否具有普遍价值上而不是其合理化方面或其线性的时间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勾勒出一个符合中国特殊性的中国版现代化图景的重要性要远胜于质疑这一现象的非人性化趋势。

现在笔者将简要分析四个有关否定激进主义时的两面性的例子。首先是上海历史学家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其中明确宣扬了历史延续性作为现代性理论的一部分。一方面，萧功秦主张渐进式改革，并基于社会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一信仰而强调特殊情况的重要性。对萧氏而言，每一种要素都是社会统一体的一部分，故从另一系统引入一种要素会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如同柏克式保守主义，萧功秦批判法国模式的自由主义，因为其建立于宏伟计划、第一原则及蓝图设计之上。但另一方面，萧氏提到他的理论时又明确地将之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虽然他多次援引柏克以描述其渐进改革模式，但他真正的灵感来源却是 19 世纪晚期的翻译家严复 (1854-1921)。萧氏将其理论表述为柏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事实上，他极少将在理解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时加入柏克的理论。

鉴于保守主义与社会进化论在不断摸索这一信仰上，对自然增长的强调，及考虑到特殊情况的重要性这些方面的部分重合，这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是社会进化论者设想中的变化是连续的、定向的、内生的、必要的，并与大的抽象实体有关联；但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变化是偶然的、外生的，并与具体的历史资料有关。萧氏的目的在于保证逐步市场化的效率，他接受了他如此批判的普遍现代化理论中的进化乐观主义。

第二个体现这种一方面批判了中国现代性对历史延续性的否定，另一方面又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现代化以及现代时间的观念的两面性的例子，是 1992 年的《二十一世纪》上的关于中国近代史性质的一场辩论。¹⁶ 这场辩论的主要参与者是前文提到过的历史学家余英时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姜义华。余姜二人间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化大革命究其实质是否激进这一问题，这场辩论中除此二位之外的其他参与者则将辩题由中国近代史的性质问题转向了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对暴力革命批评如今被内嵌于(embedded in)对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辩护中。另外，很多知识分子都援引卡尔·波普尔“渐进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的概念以倡导渐进式经济改革。这种思路顺应了官方改革政策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官方政策所提倡的正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场辩论中，社会主义传统才是主要被攻击点，而现代性本身并未受到太多质疑。相反的，知识分子明确接受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历史增长的概念被作为哈耶克自由秩序是历史增长的这一论点的一部分得到支持。但是这种对改革政策的拥护是何种程度上的对毛时代历史断裂的真正的反思？这是否真与时间、变动的概念或者中国传统的性质有关？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曾正确指出，中国的保守主义并未设法脱离激进主义的线性关系。与激进主义一样，它仍以发展为目标。

第三个 1990 年代早期这种模糊批判的例子可见于新儒家陈来(1952-)的著作。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陈来也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激进主义的三个阶段：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 1980 年代。但是陈来的主要攻击点是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可谓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这种批判抓住了理性化、

¹⁶ 这场辩论中的重要文章包括：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第 10 期（1992 年 4 月），第 134-142 页；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二十一世纪》，第 10 期（1992 年 4 月），第 143-149 页；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二十一世纪》，第 11 期（1992 年 6 月），第 133-136 页；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二十一世纪》，第 11 期（1992 年 6 月），第 137-140 页。

异化以及个人主义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问题。陈来跟随马克斯·韦伯的足迹批判了现代化进程中取代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陈来认为，传统是现代生活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家，能够凝聚社会，还是现代性疾病的解药。¹⁷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陈来与其他所谓新儒家有大量关于传统内在价值的论述，他们却都参与了儒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他们认为，韦伯的儒家无助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论断是错误的。在新儒家看来，东亚经济奇迹正是对韦伯关于儒家理论的重大挑战。陈来认为，至少在初始阶段儒家伦理在吸收资本主义中发挥了作用。虽然陈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了对韦伯的讨论，即将之作为现代世界中传统意义的讨论，但评论家们仍将新儒家的参与理解为对资本主义不加批判的接受。尽管新儒家一方面运用儒家价值以纾解不道德的资本主义之弊端，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儒家道德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其作用。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是 1990 年代早期中国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¹⁸与这一时期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后现代主义者也攻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性。1989 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检讨了 1980 年代的直接对抗战略与对自由主义的认可。五四精神以及 1980 年代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如今被认为是将对中国变成他者的西方现代化的鼓吹。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后现代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的，同时又是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的。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远离诸如革命、国家、阶级等话题。故而一方面，诚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纪霖所言，关于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主流话语开始为历史反思所取代。这些反思构成了 1910 年代与 1980 年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对话。

但另一方面，这些反思具有的真正的批判性的程度确实值得商榷的。例如，文化评论家张颐武认为 1989 年之后，现代性知识型已为“中华性”(Chineseness)所取代。这一知识型并不遵循西方的线性发展观，但它赞同多元化：每个国家都可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¹⁹然而，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在很多方面仅仅是对国家特殊性的拔高。因为如果真的强调多元化，为何这一知识型又要被称之为“中华性”？

¹⁷ 陈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参见：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¹⁸ 这场辩论的主要文章收录于：汪晖、余国良编：《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 年。

¹⁹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 年第 2 期，第 10-20 页。

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但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是绝对的、普遍的。

这并非对现代性的真正质疑，而只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西方产物进行的批判。这种质疑仅仅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为加速这一进程而服务。如果西方模式的发展受到批判，那只是因为又有了更好的模式，一种考虑到了中国中心式现代化的模式。由于现代化的负面原则并不能被归咎于这种模式本身，但究其性质它毕竟是西方的，或者说是普遍的，一旦这一模型离开了西方的根基，对产生问题的现代化的性质的质疑就不会触及到其本身。

结语

那么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到底具有何种程度的批判性？一方面，他们可以说自己具有真正的批判性，因为他们质疑了发展必须破旧这一百年来的信念。正如余英时所言，这是一种求新的心态，正是这种对新事物的痴迷摧毁了中国传统。1990年代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彻底改变了这种已经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信念，他们相信现代性也有其局限性。这种新的对历史延续性思想的接纳为新学术趋向如1994年以来的国学复兴等铺平了道路。这种对历史延续性的新关注不仅表现在对政治合法性的再思考上，也表现在跳脱革命的范式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活动中。这种重新书写不仅意味着历史在形成国家认同中的重要性得到重申，也意味着国家认同更多的被认为是文化层面的而非阶级或国家层面的。

这种批判精神也受到现代性在中国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种西方产物这一事实的限制。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无法真正落实到现代性的弊端上来，他们更倾向于追寻一条更加切实可行的、不带有西方范式的现代化道路。现代性的普遍性方面受到的否定并非源自哲学层面的思考，而是因为对特殊性的强调为中国提供了一条跳脱他者化(**Otherization**)进程的道路。虽然这一定律也有例外——陈来这样的知识分子们是因为传统的内在价值而拥护传统；此外陈来还认为儒家价值观的某些核心观念具有普遍性——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普遍无法摆脱对中国现代化的强烈关注。对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当下乃是历史长链的最后一环；对时刻肩负中华民族命运重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下仅仅是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的开始。